

文化周刊

中华读书报

■本版编辑:赵晋华 ■电话:010-67078073

■E-mail:dushubao@263.net 2018年8月8日

第 416 期 13



《九歌》何处来?

■陈民镇

众所周知,《楚辞》收录了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的组诗《九歌》,是分别赞颂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东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国殇诸鬼神的乐歌歌辞。它究竟是屈原的天才创作,还是如王逸所说是屈原在楚地“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基础上的改编?抑或另有来源呢?

有人说《九歌》天上来。相传夏启飞升天庭,将天乐《九歌》带至下界。暂且不论这一故事的神话色彩,此《九歌》是否便是彼《九歌》也是很成问题的。

有人说《九歌》域外来。笔者在《秦帝国是否受到波斯的影响?》(载《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1日,第9、10版)一文中已提及,宋大可先生在《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认为《九

歌》是在波斯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如拙文所论,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古代中国与波斯虽有一定的文化交流迹象,但总体上是间接的,没有证据表明波斯文化在思想层面对中国文化有显著的影响。更何况宋氏所列波斯神系与《九歌》神系的比较难以看出内在的一致性,他所指出的楚人业已皈依拜火教更显证据不足。

说楚辞受域外文化的影响,此前亦不乏其人。如苏雪林女士即认为《天问》受古代希伯来及印度文化的启发,饶宗颐先生则在其名文《〈天问〉文体的源流——“发问”文学之探讨》(载台北《考古人类学刊》第39、40期之合刊中册,1976年6月)中旁搜远绍,全面讨论世界范围内的“发问”文学,说明“发问”是世界诸文明的一种普

遍现象,不必以传播论的眼光来看待。

近来江林昌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发表宏文《远古部族文化融合创新与〈九歌〉的形成》(以下简称“江文”),对《九歌》的形成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江先生认为,传统关于《九歌》是屈原在楚民间祭祀乐曲基础上创作而成的认识并不全面,它由海岱东夷族虞舜时代的《虬歌》、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生命生育祭歌以及流传于楚地的山川祭歌等构成。伴随着春秋战国时期血缘管理的瓦解、地缘管理的出现,这些不同区域、不同族属的远古史诗祭歌开始在部族外广泛交流融合。楚国特殊的历史渊源、楚怀王一统天下的雄

心、屈原所处时代及其巫史身份等因素,使得屈原成套编组并加工润色《九歌》成为可能。

江文的突出特点在于将《九歌》的创作纳入到文明史的视野中考察,结合考古发现探索部族文化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并揭开了《九歌》之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特殊意义。

根据江文,《九歌》的来源是多元的。湘君、湘夫人无疑是地域色彩的,山鬼的形象颇具楚文化特色,国殇也就是楚国阵亡将士而而言的。至于“东皇太一”、“太一”具有终极意义,在《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以及《吕氏春秋》《淮南子》《文子》(主要是道家文献)中,它相当于“道”,是宇宙的始源与至高存在;而于弹库

楚帛书所见“太一伏羲”(裘锡圭先生释)、《九歌》所见“东皇太一”以及《鬻冠子》所见“泰一”,则是至上神的名号,楚帛书中的太一伏羲正扮演了创世神的角色。可见抽象的“太一”与神格化的“太一”实际上是相统一的。李零先生曾将楚简中一个从“大”的字解释为太一神,不过董珊先生认为它实际上是“厉”,指厉鬼,而与“太一”无涉。三代“大传统”所崇奉的“帝”或“天”,便是至上神,“东皇太一”当源自三代“大传统”的共同信仰。在《九歌》中,东皇太一被称为“上皇”,即上帝。可见《九歌》中不但有楚文化特色的神祇,还有三代“大传统”乃至春秋战国的普遍信奉对象。对此,江文有更为具体的推论。

《九歌》诸神的多元色彩及其整合过程,江文将其置诸春秋战国时

期血缘管理向地缘管理转变的大背景之中,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东周以降,列国文化的地域特色增强,并产生了各自的鬼神体系。常金仓先生曾在《〈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战国时期存在一场“造神运动”,《山海经》诸书所见鬼神,许多实际上是战国之世才出现的。不少历史人物被神化,是为“历史神话化”。战国之世方术兴盛,鬼神繁兴,正是三代“大传统”衰落、转型并与“小传统”交融之后太一被称为“上皇”,即上帝。可见《九歌》中不但有楚文化特色的神祇,还有三代“大传统”乃至春秋战国的普遍信奉对象。对此,江文有更为具体的推论。

■郝振省

中国现代出版家群体

“中国现代出版家论著丛书”,选集张元济等中国现代出版拓荒者14人之代表性作品19部,展示他们为中国现代出版奠基所作出的拓荒性成就和贡献。这套书由策划到编辑出版已有近六个年头了,遴选搜寻作品颇费周折,繁简转化及符合现今阅读习惯之编辑加工亦费时较多。经过多方努力,现在终于要问世了,作为该书的主编,我确实有责任用心地写几句话,对作者、编者和读者有个交代。尽管自己在这个领域里并不是特别有话语权。

首先想要交代的是这套选集编辑出版的背景是什么,必要性在哪里?很可能不少读者朋友,看到这些论著者的名字: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钱君匋、邹韬奋、叶圣陶等会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又在“炒冷饭”,又在“朝三暮四”或者“朝四暮三”?如此而然,对作者则是一种失敬,对读者则完全是一种损失,就会让笔者为编者感到羞愧。而事情恰恰相反,西北大学出

版社的同仁们用心是良苦的,选编的角度是精准的,是很注意“供给侧改革”的。就实际生活而言,对待任何事物,怕的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怕的就是浮光掠影,道听途说;怕的就是想当然,而不尽然。对待出版物亦是这样,更是这样。确实不少整理性出版物,资料性出版物,属于少投入、多产出的克隆性出版;属于既保险,又赚线的懒人哲学?而这套论著确有它独到的价值。论著者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闭门只读圣贤书”的出版家,而是关注中华民族命运、焦急民族发展困境的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面对着国家的积贫积弱,民众的一盘散沙,生活的饥寒交迫,列强的大举入侵,和“道德人心”的传统文化与知识体系不能拯救中国的危局,在西学东渐,重塑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固守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品格,秉承“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使命,整理国故,传承经典,评介新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发表了一系列的

论著,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出版文化事业进行了拓荒性奠基。如果再往历史的深层追溯,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胸与志向的使命追求,正如北宋思想家张载所倡言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为中华民族这些前仆后继、生生不息的思想家们肃然起敬。以张元济等为代表的民国进步出版家们,作为现代出版文化的拓荒奠基者,其实就是一批忧国忧民的思想大家、文化大家。挖掘、整理、选萃他们的出版文化思想,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之举,也是为新时代实现古今会通、中西结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的必须之举。

不仅如此,这套论著丛书的出版价值还在于它是民国时期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文化群体,一批立足于出版的文化大家和思想大家;14位

民国出版家的19部作品中,有相当部分未曾出版,具有重要的填补史料空白的性质,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者、耕耘者都是一笔十分重要的文化财富之集聚。通过对拓荒和奠基了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这些出版家部分重要作品的刊布,让我们了解这些出版家所特有的文化理念、文化视野、人文情怀,反思现在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求,而忘记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精神追求等现象。

之所以愿意出任该套论著丛书的主编还有一层考虑在里面。这些现代出版事业拓荒奠基的出版家们,其实也是一批彪炳于史册的编辑名家与编辑大家。他们几乎都有编辑方面的极深造诣与杰出的成就。作为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也特别想从中寻觅和探究一位伟大的编辑家,他的作派应该是怎样的,一种风格。张元济先生的《校史随笔》其实就是他编辑史学图书的原态轨迹;王云五的《新目录学的一角落》其实就是编辑工作的一

方面集大成之结果;邹韬奋的《经历》中,就包含着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心血智慧;张静庐的《在出版界二十年》也不乏他的编辑职业之体验;陆费逵的《教育文存》、章锡琛的《〈文史通义〉选注》、周振甫的《诗词例话》等都有着他们作为一代编辑家的风采与灼见;赵家璧的三部论著中有两部干脆就是讲编辑故事的,一部是《编辑忆旧》,一部是《编辑生涯忆鲁迅》,其实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家。只要你能认真地读进去,你就会发现一位职业编辑做到极致就会成为一位学者或名家,进而成为大思想家、大文化家,编辑最有条件成为思想家、文化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就看识月不识月”。我们的编辑同仁难道不应该从中得到启发吗?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自己编辑职业的神圣性而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骄傲吗?

这套丛书真正读进去的话,容易使人联想到正是这一批民国时期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

奠基石,现代出版文化的开创者和建树者,为西学东渐,为文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他们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出版努力,他们所举办的现代书、报、刊社及其载体实际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输的重要通道,成为中西文化发展交融的重要枢纽,成为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寻求和探究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精神园地。甚至现代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出版文化的初步形成,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诞生的重要思想文化渊源。一些早期共产党人就是在他们旗下的出版企业担任编辑出版工作的,有的还是他们所在出版单位的作者或签约作者。更多的早期共产党人正是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出书、办报、办刊而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民国出版家及其拓荒性论著的价值重视还远远不够。而这套论著丛书恰恰可以对这个有所补救,我们为什么不认真一读呢?

半世情缘

■姜伟伟

生在江南,吴语轻软,米也糯软,到济南读大学便愁了吃,馒头干,不好嚼。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末,吃粮凭票,票分全国、地方,粮分细面、粗粮。大米属细面,一个月仅一斤六两;粗的是玉米面、黑面,各类杂粮,做的馒头更粗硬,更难嚼。某日,有位杭州籍男生在宿舍放声痛哭,同学劝,老乡劝,辅导员劝,甚至找来与他同组的女生劝,谁都劝不住。哭啥呀?不说。哭够,号了一嗓子:我——想——吃——大——米——饭!

我没落泪,可也挡不住对米饭拂之不去的念想。毕业死活回南方!那念头在脑海里盘旋不去。

1983年毕业,大学生是香饽饽,江苏也有名额。我前一年参加全国大学生散文竞赛拿了奖,正春风十里,却挑了个比山东更北的地方——北京人民日报社。

因为北京?北京有二十几个单位向我们招手。

因为记者风光?新华社记者似乎更牛——那时候不少电影里有这个角色,去新华社也有名额。

选择只是瞬间,而我的心底很可能已藏了一个太久太久的秘密。

2010年,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发了篇散文《心底的那块黑板》,说的是上小学时办学校黑板报的事。有同事开玩笑:你退休写回忆录可称“办报生涯五十年”。

也许,对“办报”情有独钟,真的就是那时落的种。

入社第三年参加中央讲师团,在芜湖师范支教一年,天天和幼儿园班上40个清纯阳光女孩面对面,常常不由自主地心跳加速。就找个漂亮妹子留下吧,挺好的。夜里千条路,早上起来卖豆腐。舍不得办报。

1990年调经济部,和中石油、中海油之类超级央企打交道。报社工资低,分房又老轮不上,一家三口挤“筒子楼”。来我们这里吧,有房,收入高,还有“位子”。很是诱惑。然而……谢了,不如办报。

还曾有机会调中南海,但是但是……思来想去,还是办报。

在新媒体盛况空前的当下,我最早嗅到了报纸死亡的气息。2009年3月,改革开放后最早诞生的报纸,人民日报办了30年的《市场报》转型为人民网一个频道——市场报网。作为末任副总编辑,我写了最后那期《致读者》:

“道一声再见,不是悲壮的永别,而是一次光荣的转身!”

市场报网能完成“光荣的转身”吗?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决不转身!

“纸”也许会死,但“报”,永不消亡,只要人们对媒体的需求还在,就有人办报,只不过“纸”也许变“屏”,也许……其他,正像汉字不会灭亡一样,阅读不会死,媒体不会死!

作别《市场报》,旋即创办《中国能源报》。2010年底调任人民日报社福建分社社长,首席编辑变首席记

者,“席”未暖,两年半后又回人民日报重执笔端。

还是办报,还在办报,还欢喜办报。

报纸是一种精致阅读体验,守住这份精致,才能在新媒体时代岿然屹立,这需要一批人怀抱理想坚持不懈,守正创新。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报纸的精致,源自办报人的较真。三十年前,人民日报业务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蔚然,编辑部大厅的评报栏,是每天最靓的一道风景。“感谢批评,感恩批评”,不少年青人以获得老编辑、老记者批评为荣。“评上高级记者后,恐怕还愿赐我批评的就更少了。”我的老领导、经济部主任艾丰获评人民日报第一批高级记者后,曾发出这样一声长叹。

光阴荏苒,“河东”“河西”景象大变,那“河”也早已不再那么清澈、那么湍急……

这是一个被称为“人人手里都握麦克风”的时代,办报早已光环不再,谁还批评?和谁较真?重业务、好争鸣的氛围似乎也飘零随风,化为轻絮。

退一步说,即使有人对批评欢迎依然,可你能胜任批评者的角色否?仅凭三十多年资历,仅凭个人一点感悟,如果难以超越经历的有限和经验的狭隘,又能给人多少切实帮助呢?又如何给人更开阔的视野和超越的眼光呢?这,同样也令

人纠结。

怅然之中,忍不住回望来路。

我分到人民日报就在一版上夜班。头一回写稿,是投一版的小言论专栏《今日谈》,副总编辑丁济沧亲自指导修改,从标题到内容。第二回,总编室主任陆超琪改得更细,稿件如“天女散花”,真的只恨地板上少条缝。一字一字数下来,剩下来我写的不过十几个字。哪还好意思署名。组长李济国笑着圆场:那就就陆、小费各取一字吧。刊出时署名:陆飞。

头一次写通讯,就被总编室副主任吴元富“毙”了,《学会“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中细说了此事原委。如果说一个人大局的培养要有开始的话,当是起步于这次稿子的被毙。

后调机动记者组。此前刚参加《少数民族地区纪行》报道,发表了近20篇通讯,那时人民日报才8块版,这个成绩已算不错,我向组长高新庆请战“独立写大稿”。老高却冷下脸:你那些风貌通讯就是走马观花,要学会调查研究问题。让我“跟班”到煤炭大港秦皇岛,调查当时十分猖獗的“煤倒”,写内参。

1990年,我调经济部,因为是外行,开始挺紧张,发了几篇稿,又有点名飘飘然。副主任吴克生严肃指出,你的报道只见结果不见过程,没深度,不能给人启示。亲自指导点拨,让我采访全国煤炭系统第一个放开煤价走向市场的徐州矿务局。

部主任艾丰的教诲更令我终生难忘,批评我写的一篇头版头条“把肉埋在碗底”,还把那个改写案例收进他的《新闻写作方法论》。老艾带我采访康佳集团,亲拟写作提纲,稿子出来从头改到尾,叮嘱再三:要用观点统领材料,“拎起来”写!

还有,跟着黄彩忠上夜班,学配短评,学做标题,三番五次受敲打:要把匕首的刀尖,跟着皮树义创办《经济周刊》,从选题策划到版式策划,从办报内容到办报格局,从做新闻要有意义到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再要有创新……

当年的青葱小伙,如今鬓鬓半芒。唯经时光打磨,那些往事,才会闪现内在光泽。就像一个人只有离开了故乡,那些陈年旧事才会在记忆里熠熠闪光。

一代人是该有一代人担当的,而最好的感恩,莫过于使命承担。

时光把我带到了把关人的位子上,写稿少了,看稿多了,很多来稿中的毛病,自己当初也曾犯过,豚象明,前辈当年的教诲犹在耳边。鲁迅先生说过:“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于是,我努力像当年那些对我耳提面命的前辈那样,格外认真地阅读,并遵奉鲁迅先生“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处,才于作者有益”的教导,不揣冒昧,放下息得患失,实事求是地真诚道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书中多数篇章仓促系青于工作中,未必想透,文字也不甚精准,抑或失之过于率直。也深知这般实话实说,原也未必都那么招人待见,无非一片冰心,竭诚尽瘁。

大学虽读的是中文,却没受过文艺评论训练,思维方式还止于传统的随意性、领悟性,浅显表层,缺少深度。书中主要的篇章发2014年下半年以来人民日报社地方部《值班手记》和报社内网《业务研讨》,这次总结,为弥补随笔式杂感式的散漫,加进了早些时候的部分相关工作,努力增加点宽度,增强点系统性条理性,以期相辅相济。比如十多年前应邀给《中国海洋石油报》评报写的若干札记,及其他一些场合相关的文章、发言等。

喜闻佳音,“人民眼”专栏获评2016年度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自2015年初开始,所职地方部举国内分社全体之力,创办了人民日报第一块深度报道版——《记者调查》,每周一期,迄今已发上百期,“人民眼”为该版主打专栏,我参与始终,本书中也有多篇对这个专栏稿件的批评。

这或是上苍对踏实办报、敬业谋文,力图守住报纸这份精致者的一个嘉勉吧。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当不辱使命,也注定难了此情。
《好稿是怎样“修炼”成的》, 姜伟伟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